

明代湖北进士地理分布及其成因

张晓纪

提 要：科举时代的进士是考察人才的绝佳样本。民国《湖北通志》收录明代湖北进士 1132 名，进士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失衡的特点。他们分布在湖北省除施州卫外的其他 8 府，以黄州府、汉阳府、武昌府为代表的鄂东地区集中了全省 71% 以上的进士，是进士人才的高产区；以荆州府、承天府为代表的鄂中南地区拥有全省 22% 的进士，为中产区；鄂西南和鄂北地区为进士人才低产区。除长阳、兴山、郧西、保康等县外 49 县均有进士产生，平均每县 23 名。进士人才地域分布不平衡体现出湖北省各地人文水平的高低、演变及其经济发展的损益。人才的成长与发展必定要受到地域环境的影响，但对人才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人才成长的人文环境。具体到明代湖北而言，进士人才的地域分布特征是由移民、经济开发，以及包含官学教育、书院教育、刻书业、家学、人才交流等在内的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明代 湖北 进士 地理分布

“诚欲使庠序之士，咸务实学，必先使选举之士，皆属真才。”^① 科举制度是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制度，保证了社会阶层间的正常流动，是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的重大飞跃。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社会，通过科举之路走上成才之路无疑是最好的选择。“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② 科举制度对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极大，激发了下层读书人充分运用科举考试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明代选拔人才虽有科举、荐举、铨选等途径，但“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③。

明朝科举分为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 4 级。“洪武三年五月始设科取士……六年二月诏暂罢科举，十五年八月复设科举以三年一试著为定制。”^④ 乡试是正式科考的第一关，洪武十五年（1382）规定每 3 年一科为定制，中试者方成为举人。从举人到进士还需通过会试成为贡士，而殿试只用来定出名次，能参加的贡士通常都能成为进士，一般不会再有落第的情况。

科举时代的进士是考察人才的绝佳样本。考较各地进士数量的多寡及其变化，有助于分析各地人才的兴衰，也能推知该地文风的高下及演变。潘光旦曾对人才取样对象有过精彩的论述：“他们之所以成为人才，多少是有相当的智能做基础的；他们所以为人才的证据，在今日只能见诸人的记录，和他们自己遗留下来的功业与作品。但假若我们有方法来推测他们的智能，他们的分数，例如‘智商’之类，和今日所称人才所得的测验分数，怕不会有多大的分别。”^⑤ 以上两点均体现历史上的人才之所以成为人才是因为见诸别人的记录，或是他们自己遗留下来功业和作品而为后人知晓。这才能为研究者提供可研究的资料 and 条件。

① 陈元晖、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的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年，第 73 页。

② 王栻：《严复集（一）》，《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66 页。

③ 《明史》卷 69《选举一》，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675 页。

④ 吕调元、刘承恩修，张仲炘、杨承禧纂：民国《湖北通志》卷 124《人物志》，“选举表二”，民国 10 年（1921）重刊本，台湾华文书局，1967 年，第 2813 页。

⑤ 潘光旦：《近代苏州的人才》，《社会科学》1935 年第 1 卷第 1 期。

本文以民国 10 年出版的《湖北通志》为研究蓝本。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在整理出版这本通志时评价：“民国 10 年《湖北通志》是新中国成立前最后出版的，也是字数最多的一本通志，全书 172 卷，约 1500 余万字……其纪事无上限，下限为宣统三年（1911）。 ”^① 吕调元对这一版《湖北通志》评价道：“己未春余归长皖，适次珊以鄂志成书见告，索序弁首，余喜其为各省志之先导也，亟撮述其大凡，归之次珊，并以告地方事业者。”^② 可见这是一部珍贵的地方历史资料，具有很高的价值。

一 明代湖北进士地域分析

《湖北通志》收录明代湖北进士 1132 名，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他们分布在全省除施州卫外的 8 府，除长阳、兴山、郧西、保康 4 县外其余 49 县均有进士产生，平均每县 23 名，体现出各地区人文水平的高低、演变及其经济发展的损益。

（一）县域分布

明代湖北进士人才数量最多是麻城县 104 名，最少的当阳、竹山、上津 3 县均仅有 1 人，相差 100 倍之多；而仅就第二名的黄冈 86 名来看，麻城也比它多 18 名，麻城县人才发达可见一斑。超过平均线 23 名的县有麻城、黄冈、江陵、江夏、蕲州、石首、襄阳、京山、蕲水、兴国、汉阳、蒲圻、孝感、公安、沔阳、崇阳、潜江、安陆、应城 19 个县，共计 815 名，进士数量占全省 72%。

在以上 19 县中，黄州府有麻城（104）、黄冈（86）、蕲州（40）、蕲水（36）；江夏（64）、兴国（36）、蒲圻（35）、崇阳（28）属武昌府；荆州府有江陵（67）、石首（40）和公安（31）3 县；承天府有京山（37）、潜江（26）、沔阳（30）3 州县；德安府有孝感（33）、安陆（24）、应城（24）3 县；汉阳府仅府治汉阳县（35）1 县；襄阳府仅府治襄阳县（39）1 县。详见表 1。

表 1 明代湖北进士地域分布一览表

单位：名

府州	辖州或县	进士	府州	辖州或县	进士
武昌府（234）	江夏	64	黄州府（330， 黄州 1 人）	黄冈	86
	武昌	13		麻城	104
	嘉鱼	22		黄陂	17
	蒲圻	35		黄安	7
	咸宁	17		蕲水	36
	崇阳	28		罗田	7
	通城	2		蕲州	40
	兴国州	36		广济	12
	大冶	10		黄梅	20
	通山	7			

① 吕调元、刘承恩修，张仲炘、杨承禧纂：民国《湖北通志》，“出版说明”，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 年影印本。

② 吕调元、刘承恩修，张仲炘、杨承禧纂：民国《湖北通志》，“序”。

(续表)

府州	辖州或县	进士	府州	辖州或县	进士
襄阳府 (69)	襄阳	39	承天府 (147, 荆门8人)	钟祥	22
	宜城	6		京山	37
	南漳	5		潜江	26
	枣阳	7		当阳	1
	谷城	5		沔阳	30
	光化	2		景陵	23
	均州	5		安陆	24
郧阳府 (10)	郧	3	德安府 (110)	云梦	8
	房	2		应城	24
	竹山	1		孝感	33
	竹溪	3		随州	12
	上津	1		应山	9
	郧西	0	汉阳府 (42)	汉阳	35
	保康	0		汉川	7
荆州府 (190, 荆州1人, 夷陵14人)	江陵	67	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 (0)	大田军民千户所	0
	公安	31		施南宣抚司	0
	石首	40		散毛宣抚司	0
	监利	16		忠建宣抚司	0
	松滋	8		容美宣抚司	0
	枝江	3		木册长官司	0
	长阳	0		镇南长官司	0
	宜都	5		唐崖长官司	0
	远安	3			
	兴山	0			
	巴东	2			

说明：①资料来源于民国 10 年《湖北通志》选举志，不包括武进士。②行政区划以《明史》为准

明代湖北进士人才发达，他们以中进士为起点，又有很多人才成长为优秀的政治人物、学术人物等，留名青史者数不胜数。如洪武十八年（1385）乙丑科荆州府进士夷陵人赵勉曾任户部尚书，同科进士江陵人刘俊任兵部尚书。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榜状元襄阳人任亨泰，官至礼部尚书。①

① 参见吕调元、刘承恩修，张仲炘、杨承禧纂：民国《湖北通志》卷 124《人物二》，“选举表”，第 2814 页。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科进士，武昌府江夏人张天祐曾出任吏部尚书，是朱元璋的重臣。再如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进士荆州府石首人杨溥，号称“南杨”，武英殿大学士。^① 再如京山人郝敬，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科进士，著名经学家与思想家，《明儒学案》评价他：

不为要人所喜，考下下再降，遂挂冠而归，筑园著书，不通宾客。“五经”之外，《仪礼》《周礼》《论》《孟》各著为解，疏通证明，一洗训诂之气。明代穷经之士，先生实为巨擘。

先生以淳于髡先名实者为人，是墨氏兼爱之言，后名实者自为，是杨氏为我之言。战国仪、秦、鬼谷，凡言功利者，皆不出此二途。杨、墨是其发源处，故孟子言：“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所以遂成战国之乱，不得不拒之。若二子，徒有空言，无关世道，孟子亦不如此之深切也。此论实发先儒所未发。^②

郝敬敢于创新，不拘泥于前人之说。楚学之盛，唯耿天台一派。^③

因明代湖北进士县间存在明显差异，我们将人才发达县列出，制成表 2。为得到更直观的印象，笔者将明代湖北部分县进士人数制成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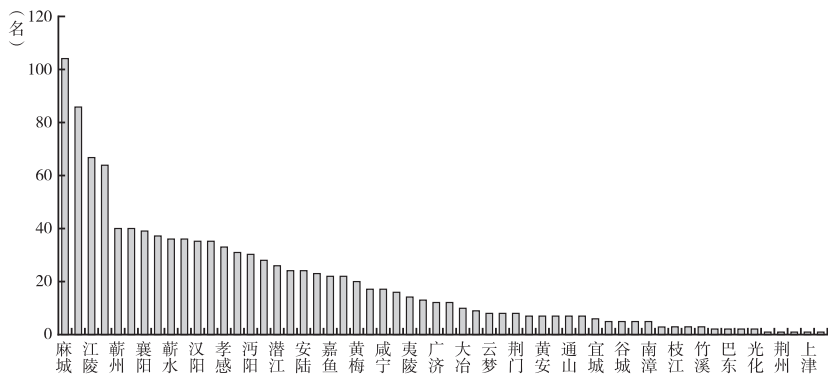
表 2 明代进士发达县情况一览表

	县名	进士人数	占总数比率（%）
特别发达县	麻城	104	16.8
	黄冈	86	
其次发达县	江陵	67	11.6
	江夏	64	
一般发达县	蕲州	40	34.6
	石首	40	
	襄阳	39	
	京山	37	
	蕲水	36	
	兴国	36	
	汉阳	35	
	蒲圻	35	
	孝感	33	
	公安	31	
	沔阳	30	

① 参见吕调元、刘承恩修，张仲炘、杨承禧纂：民国《湖北通志》卷 124《人物二》，“选举表”，第 2818 页。

② 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 55《诸儒学案下三》，“给事中郝楚望先生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314 页。

③ 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 28《楚中王门学案》，第 627 页。



由图1和表1、表2可知明代湖北进士集中在黄州府的麻城、黄冈、蕲州、蕲水；荆州府的江陵、公安、石首；武昌府的江夏、蒲圻、兴国；承天府的京山、沔阳；襄阳府的襄阳；汉阳府的汉阳；德安府的孝感等地。黄州在明代已一跃成为文化名人辈出的文化大邦；麻城在历史舞台上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在全省范围内奠定了黄州、武昌两大文化大邦的基本格局。明代湖北约25%的县集中了63%的进士，其中特别发达的是麻城和黄冈两县，占16.8%，其次发达的江陵、江夏两县也不过11.6%，一般发达的县亦占34.6%，说明明代湖北进士人才基本上呈中间小两端大（上端比下端小）的“哑铃型”分布状态。

（二）府域分布

府域分布上黄州、武昌、荆州、承天4府拥有全省近80%的进士，加上德安府竟高达89.3%；第一位的黄州府进士比第二名武昌府多96人。黄州府堪称明代湖北第一进士府，在其1州8县的辖域内，共产生了330名进士，平均每州县得进士近37名；武昌府以234名进士位居第二，府内平均每州县得进士23.4名，高出省平均数，两地均为进士高产地区。汉阳府以两县得进士42名；承天府以5县2州得进士147名，两地平均每州县得进士21名，为进士次高产区。德安府以5县1州得进士110名，平均18.3；荆州府以11县2州得进士190名，平均14.6；襄阳府6县1州得进士69名，平均9.8，为明代进士低产区。

进士数前五名府中,鄂东地区有黄州府、武昌府和德安府;鄂南地区有荆州府;鄂北有承天府。见图2,显而易见鄂东地区占据绝对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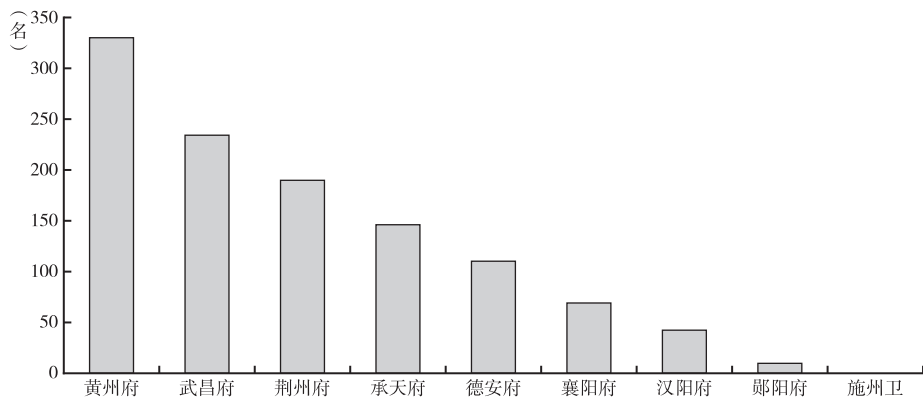


图2 明代湖北进士府域分布图

（三）地区分布

地区分布有以下特征：一是鄂东地区以 734 名进士高居第一位，是鄂中南 286 名的 2.5 倍，是鄂北 91 名的 8 倍，是鄂西南 21 名的 35 倍。二是鄂东地区培养出明代湖北高达 64.8% 的进士，若加上江汉平原上的中南地区，则拥有明代湖北 90% 以上的进士。这也印证了张笃勤的观点，即“明清时期，鄂东地区文化勃兴，人才蔚起，黄州府科甲兴旺更名列各府第一。这种文化地理的变动，彻底改变了湖北文化重心长期徘徊于江汉地区的格局”^①。三是鄂北和鄂西南地区进士人才数量少，产出不高。

明代湖北产生了一批科举精英。其中有 2 位状元，他们分别是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戊辰科襄阳人任亨泰、明万历八年（1580）庚辰科江陵人张懋修。一甲二名有 3 人，分别是万历五年丁丑科榜眼江陵人张嗣修，万历八年庚辰科会元、榜眼汉阳人蔡良友，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榜眼江夏人贺逢圣、文渊阁大学士。一甲三名有 2 人，是永乐十九年（1421）辛丑科探花监利人裴纶和万历二十九年辛丑科探花石首人曾可前。由此可见，明代湖北科举精英的 7 人中，江汉平原占 4 席，有 2 人来自鄂东地区，鄂北地区襄阳府有 1 人。

对于明代中期的湖北，不得不提及的是汉口的兴起，“往来楚蜀者达三十年”^② 之久的范锴在《汉口丛谈》中曾详细描述了汉口的崛起经过。“今汉口以大别为朝山，南岸为近案，后湖空旷，正合坐空朝满之局，从前卫盛者以水未绕也。明成化初，水通前道，故河遂淤，于是汉口有兴机矣。盖汉口初一芦洲耳，洪武间未有民居。至天顺间，始有民人张添爵等祖父在此筑基盖屋。嘉靖四年丈量，上岸有张添爵房屋六百三十间，下岸有徐文高等屋六百五十一间。汉口渐盛，因有小河水通，商贾可以泊船，故今为天下名区。”^③ 汉口的兴起是在湖北省政治中心东移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故河道淤积，形成低洼地带，又因周边水陆交通发达，慢慢兴起了汉口镇。

从明代进士的地区分布来看，武昌周边的黄州府、汉阳府、德安府均是人才发达区，这与湖北政治中心确立在鄂东地区不无关系。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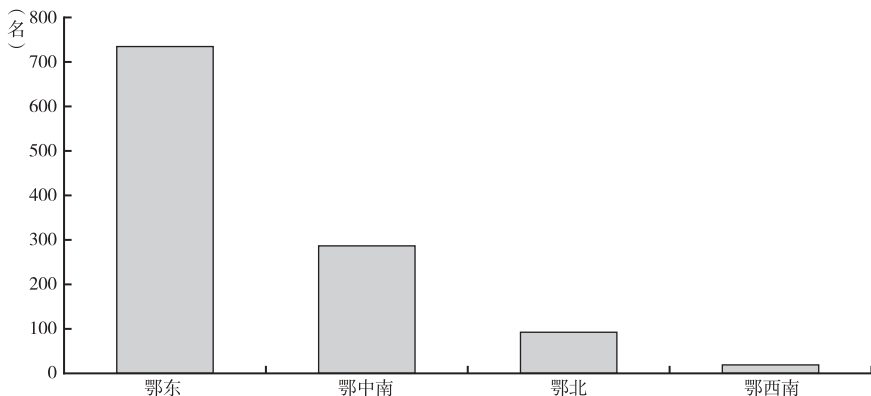


图 3 明代湖北进士地区分布图

① 张笃勤：《明清黄州文化科举兴盛及其社会根源》，《学习与实践》2009 年第 3 期。

② 范锴著，江涌、朱忱等校：《汉口丛谈校释》，“前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 页。

③ 范锴：《汉口丛谈》卷 1，道光壬午刊本。

二 明代湖北进士的密度分析

人才密度分布是研究各类人才的重要指标，因此，笔者在明代进士的区域人才数的基础上，制作密度分布表进一步分析。详见表 3。

表 3 明代湖北进士密度分布表 密度单位：人/百万、人/万平方公里

府州	进士数	百分比	名次	人口	人口人才密度	名次	人才集中度	面积	面积人才密度	名次
武昌府	234	20.7	2	320000	731	4	263.1	27795.68	84	3
汉阳府	42	3.7	7	50000	840	3	3033.8	2768.77	152	2
黄州府	330	29.2	1	740000	446	7	278.6	16004	206	1
承天府	147	12.3	4					24282	61	5
德安府	110	9.7	5	70000	1571	1	725.1	21673.3	51	6
荆州府	190	17.5	3	354000	537	6	175.3	30611.8	62	4
襄阳府	69	6.1	6	70054	985	2	502.6	19596	35	7
鄖阳府	10	0.9	8	16824	594	5	306.6	19384.8	5	8
施州卫 军民指 挥使司	0	0	9					24111	0	9
总计	1132			1620878	698		37.5	186227.35	61	

说明：人口以洪武二十四年（1391）人口数为准，承天府除京山、景陵、沔阳外人口资料缺乏，无法得知。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 4 卷《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24—129 页。面积以各府州所辖范围的当今面积计算所得

（一）人口人才密度

从进士人才人口密度来看，明代德安和襄阳两府均因人口基数小而占据优势。德安府进士人才密度排在第 1 位。襄阳府进士数和面积人才密度在全省也并不靠前，而人口人才密度则排在第 2 位。黄州府因人口基数大，人口人才密度排在第 7 位。每百万人口中产出进士数在平均线 698 名以上的有德安、襄阳、汉阳和武昌 4 府。具体见图 4。

（二）面积人才密度

从面积人才密度来看，黄州府在进士数量和面积人才密度上稳居第 1 位。汉阳府以仅辖 2 县的面积位居第 2 位。武昌府在三个指标上分列第 2、4、3 位，属于进士人才产出较多的府。面积人才密度有 5 府高出平均数 61 名，超全省半数的区域，分别是黄州府、汉阳府、武昌府、荆州府和承天府。前三府属于鄂东地区，后两府属鄂中南地区。德安府进士人才数和面积人才密度分列第 5、6 位，排名并不靠前。荆州、承天、德安、襄阳 4 府为第二梯队，属面积人才密度次发达区域。鄖阳府和施州卫为不发达区域。前三位均为鄂东地区的府。随后的是荆州和承天两府为江汉平原的中南地区。具体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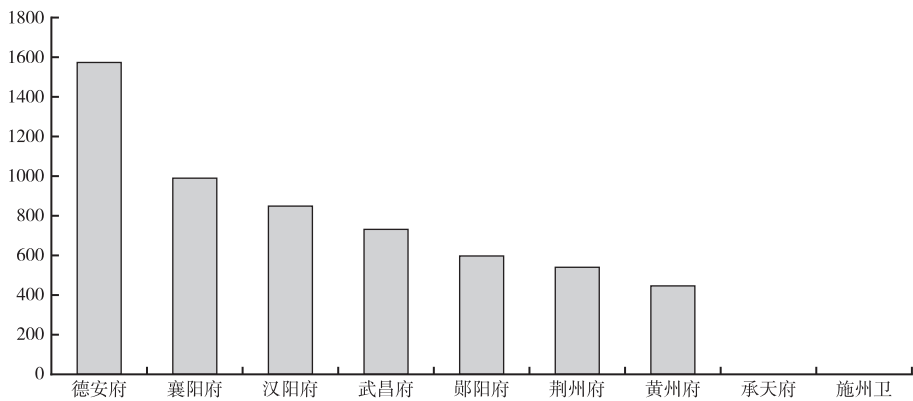


图 4 明代湖北进士人口人才密度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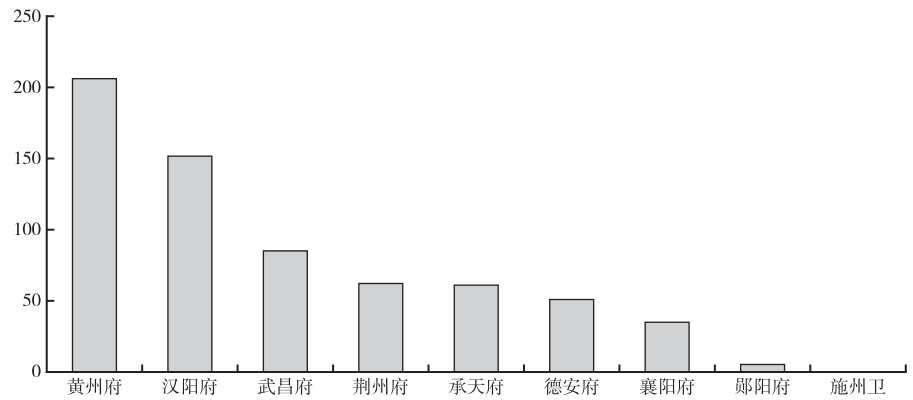


图 5 明代湖北进士面积人才密度分布图

（三）人才集中度

从人口和面积两个指标来分析，汉阳府为明代湖北进士最为突出地区，其次为德安府，襄阳、鄖阳、黄州、武昌、荆州等府在一个层级上。承天府因数据不全无法计算，施州卫进士人才数为 0。具体见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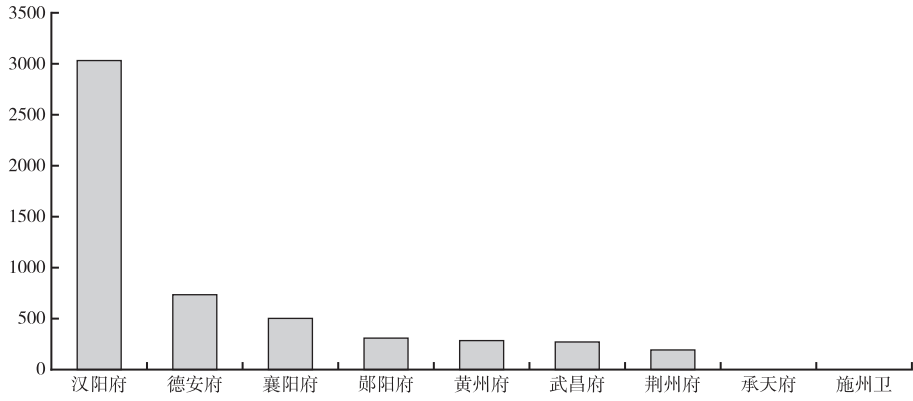


图 6 明代湖北进士集中度分布图

三 明代湖北进士的变迁分析

有明一代，共开科89^①榜，明代湖北1132名进士（计入宣德十年〈1435〉乙卯童子科松滋的田琼和嘉靖四年〈1525〉丁酉童子科黄冈的王追美2人），平均到每榜得进士约12.7名。其中洪武四年（1371）辛亥科、洪武二十四年辛未科、洪武三十年丁丑科和正统元年（1436）丙辰科湖北无人中进士。除去这4榜和童子科2人，则湖北平均每科得进士13.3名。

（一）明代各朝开科次数及湖北进士

明代延续276年，除明初洪武年间（时长31年，开科6次）外，基本延续3年一开科的定制，平均每朝开科约6次，其中以万历年间共续47年开科16次为最，其次是嘉靖朝45年开科15次。具体可见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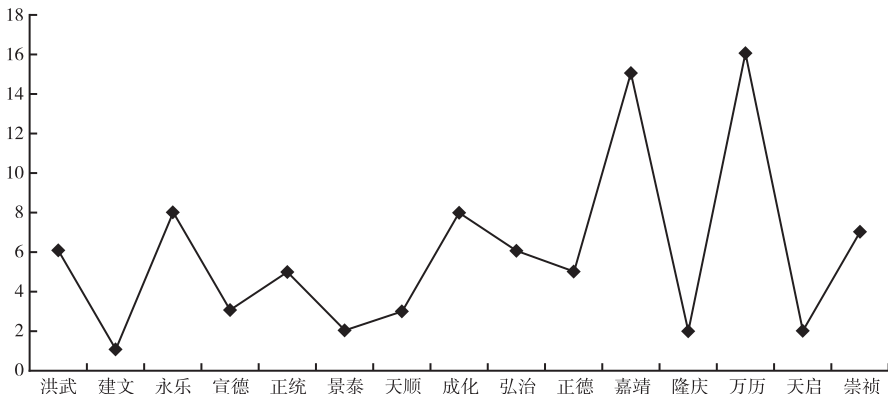


图7 明代各朝开科次数图

（二）分朝分榜统计

万历朝湖北共得进士291名，为历朝之最；其次是嘉靖朝241名；再次为崇祯朝117名；依进士数依次为正德朝89名、成化朝82名、永乐朝75名、弘治朝68名、隆庆朝53名、天启朝43名、天顺朝23名、洪武朝14名、正统朝12名、景泰朝11名、宣德朝9名、建文朝4名。其中，仅万历、嘉靖、崇祯、正德、成化和永乐6朝在平均数以上，均为明代中后期。具体可见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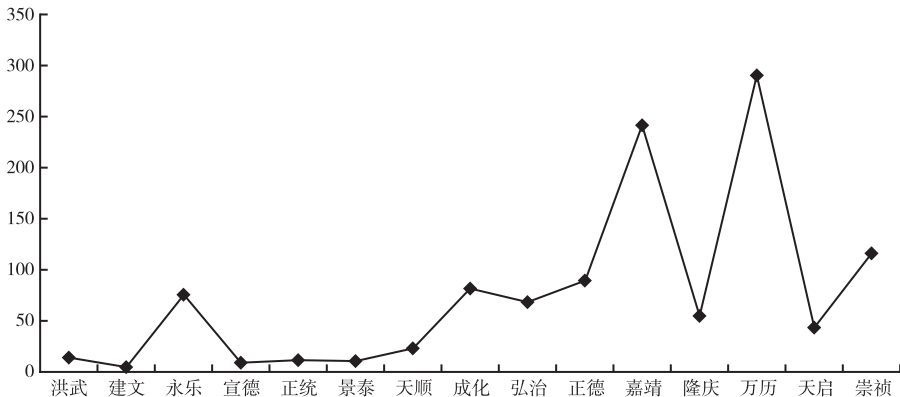


图8 明代各朝湖北得进士图

① 参见朱保炯、谢沛霖编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总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5页。

由图8可知,每朝平均得进士数在平均线以上的也是明后期6朝,即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崇祯朝。这说明明代后期湖北进士人才成才率远超过前期。前期从洪武年间的2.3名^①到建文朝的4.0名,再到永乐朝的9.4名,永乐朝出现了湖北进士成才一个小高峰;到宣德(3.0名)、正统(2.4名)年间出现下降,景泰朝(5.5名)以后,湖北进士成才率一直呈逐渐递增模式增长;正德朝达17.8名,嘉靖朝达16.1名,至隆庆朝达到顶峰,平均每榜得进士26.5名;万历朝有所下降,平均每榜得18.2名,至天启朝又升至21.5名。到明末崇祯年间降至16.7名,比成化以前的历朝平均数都要高,可见明代后期湖北进士人才已经上升到一个较高的高度。具体可见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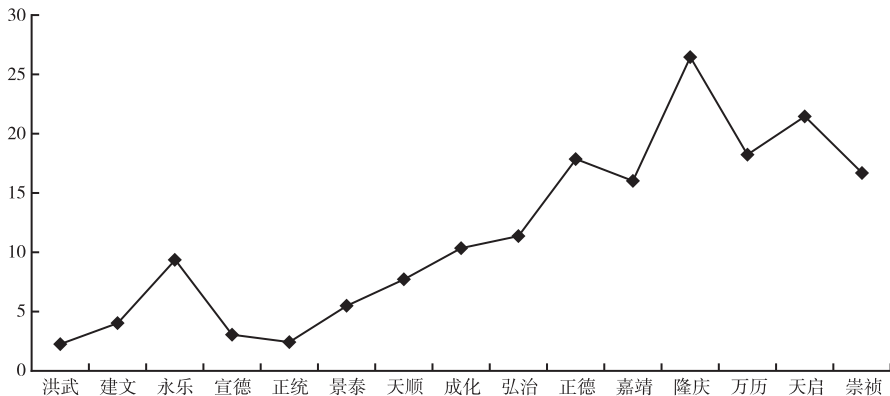


图9 明代各朝平均每榜湖北得进士图

据分榜统计情况可知,高峰出现在隆庆五年(1571)辛未科张元汴榜(29名)、嘉靖三十二年(1553)癸丑科陈谨榜(28名)、永乐二年(1404)甲申科曾启榜(26名)、隆庆二年戊辰科罗万化榜(24名)、天启二年(1622)壬戌科文震孟榜(24名)、万历二十六年(1598)戊戌科赵秉忠榜(23名)。另有9榜即正德十六年(1521)辛巳科杨维聪榜、万历十一年癸未科朱国祚榜、万历十四年丙戌科唐文献榜、万历二十三年乙未科朱之蕃榜、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钱士升榜、万历四十七年己未科庄际昌榜、崇祯元年(1628)戊辰科刘若宰榜、崇祯四年辛未科陈于泰榜、崇祯十年丁丑科刘同升榜均得进士22名。

以上15榜均为明代湖北进士高产时期,可以看见,13榜均出现在明代后期。其中,万历朝有6榜,崇祯朝有3榜,隆庆朝有2榜,永乐、正德、嘉靖、天启朝分别有1榜。进士产出具体分榜示意图详见图10。

(三) 演变趋势

通过分析明代湖北各朝的进士发现,天顺(含天顺)以前7朝各府进士数较少,天顺以后8朝进士人才成长快,尤其以黄州、武昌、荆州、承天、德安5府为代表。天顺以前仅永乐年间有武昌、荆州、黄州3府进士超过两位数,分别为23、21、10名;其余5府均为个位数,进士人才不突出。

再看各府历朝的进士情况,黄州府除景泰朝没有出进士外,其余14朝均有进士产生,天顺以前有6朝为个位数,到成化以后进士人才辈出,以万历朝出100名进士为最,嘉靖朝71名,

^① 指各朝平均每榜湖北得进士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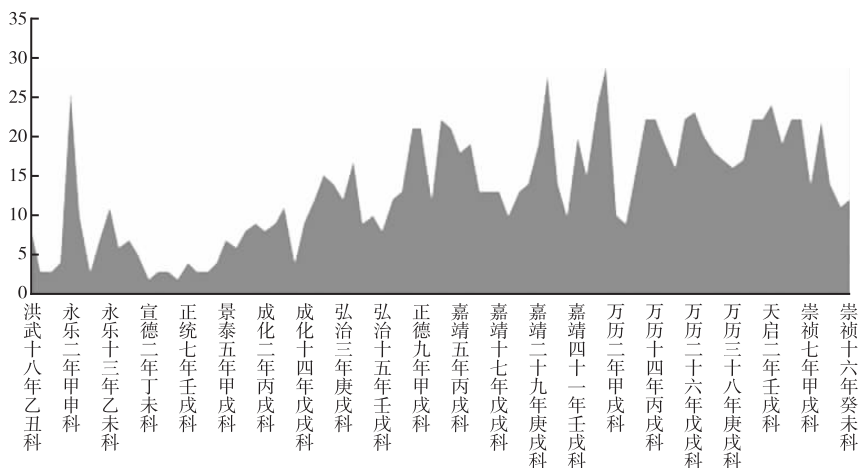


图 10 明代湖北进士分榜图

崇祯朝 41 名，正德朝 26 名，成化朝 24 名，弘治朝 18 名，隆庆朝 15 名，天启朝 13 名。这 8 朝均为明代中后期。武昌府进士人才比黄州府平均，15 朝均有进士产生，最少的建文朝 1 名，最多的万历朝 50 名。与黄州府相同的是成化以后进士人才比前期突出。鄖阳府有 9 朝没有产生一名进士，为明代进士不发达府；汉阳府有 5 朝、襄阳府有 4 朝、德安府有 3 朝没有产生进士，均在天顺以前。明代荆州府进士人才稍逊武昌府，但每榜得进士数比较平均，共有 9 朝进士在平均数以上，前期有永乐和天顺两朝，后期有弘治、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和崇祯 7 朝。在明代前期，武昌府有永乐朝，荆州府和襄阳府都有永乐和天顺两朝超过平均数，而黄州府在前 7 朝均没有超过平均数。

黄州府进士人才从成化以后有集中趋势，如成化年间平均每榜得进士 3 名，弘治朝仍然是 3 名，正德朝则增至 5.2 名，嘉靖朝 4.7 名，隆庆朝 7.5 名，万历朝 6.3 名，天启朝 6.5 名，崇祯朝 5.9 名，后 6 朝均超过平均数 3.7 名。

若以明成化朝为界，将明代分为前期和中后期，则前期为洪武至天顺朝，共 7 朝开科 28 次，湖北得进士 147 名，平均每科得进士 5.2 名；中后期为成化至崇祯朝，共 8 朝开科 61 次，湖北得进士 985 名，平均每科得进士 16.1 名，是前期的 3 倍多。这些数据说明明中后期是湖北进士的飞速发展阶段，由此也从侧面印证了明代中后期是湖北文化的高峰期。湖北作为长江流域文化的代表，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亦与袁行霈等在《中华文明史》中将唐宋以至明中叶视为中华文明成熟期的看法是一致的。^①

人才分布的时空变迁反映了明代湖北人才在时间维度上的变迁和籍贯分布上的空间变化。从全省来看，进士人才分布的多寡与疏密，反映了该时代该地区进士人才成长的状况，从而凸显出当时湖北的人才中心所在地。通过研究明代湖北进士人才数量及地域分布和密度分布，可以总结出以下结论：以黄州府、汉阳府、武昌府为代表的鄂东地区是进士人才的高产区，占全省进士的 71% 以上；鄂中南地区进士为中产区，约占全省进士的 22%；鄂西南和鄂北地区为进士人才低产区。地域分布示意图详见下页图 11。

① 参见袁行霈等编：《中华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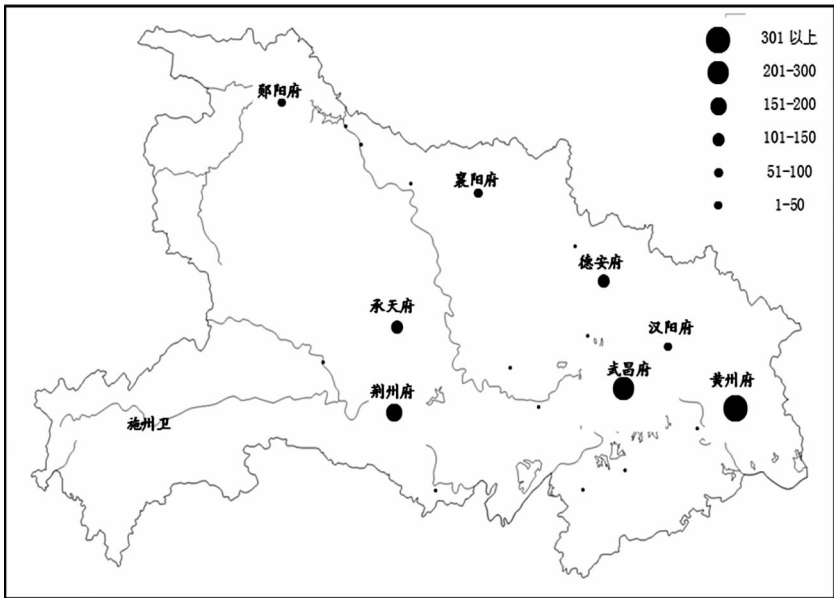


图 11 明代湖北进士分布图

相较明初，明中后期湖北进士人才始终保持一定产出率。从明景泰朝以后，平均每科得进士数逐步提升，一直持续到隆庆朝达到最高峰，可见明中后期湖北人才的高产出率。至明中叶嘉靖年间第一部湖广通志的纂修，也可佐证在这一时期湖北人才已经成长起来了。“当明中叶嘉靖时，安陆何侍郎迁创为全楚志，是为湖广有志之始，厥后一修于万历。迨至前清康熙甲子，雍正癸丑，再事修辑。于时湖南北并置布政使司，旋又分闱取士，寝已划为两省。嘉庆初湖广总督吴熊光因奏请修湖北通志报，可是为湖北省志之始。”^①

综上所述，明代湖北进士集中在黄州、武昌、荆州、承天、荆州、汉阳 6 府。鄂东地区囊括了明清两代湖北高达 71% 的进士，为进士高产地区；鄂中南地区有 22% 的进士，为进士次高产地区；鄂北有 16%，鄂西南仅有 1.4% 的进士，这两地为明清时期湖北进士低产地区。

四 影响明代湖北进士人才地域分布的因素

人才分布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明代湖北进士人才地理分布呈现时空上的不平衡性，其原因纷繁复杂。明代湖北人才在空间地域上分布的不平衡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才的成长与人才群体的地理分布与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环境有十分紧密的关系，人才的成长与发展必定要受到地理环境和特定历史时期的影响与制约。

（一）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对人才成长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区域地理优势问题，即特定地域的自然地理面貌和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风貌一旦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优势，便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地域优势，

^① 吕调元、刘承恩修，张仲炘、杨承禧纂：民国《湖北通志》，“序”，第 2 页。

对人才的成长和聚散产生不可估量的无形力量。”^①“人才空间分布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的地域过程具有一致性。”^②湖北省区位优势明显，自然地理有长江、汉江、云梦泽、大别山，交通“四通八达”。民国《湖北通志》形容湖北区位优势：

鄂实泽国，地连大别、云梦、洞庭、穆陵，控扼形胜，号为东南巨镇。

湖广，大江中贯，五溪外错，汉水为带，衡岳为镇，洞庭、云梦形势之大概也。荆州当巴蜀之冲，郢阳缩商陕之要，襄德北枕河雒，蕲黄下接三吴，地之四通八达，莫楚若矣。^③

潘光旦认为，人文地理学就是要研究某类人才在某一区域的散布，或者更进一步研究他们的成绩和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山水气候之类，有什么刺激和反应的关系。^④鄂东地区地形地貌由低山丘陵和沿江平原组成，水资源充沛，低山丘陵也有很多可供开发的条件，加上与江西、安徽、河南三省相连。因此在明代无论是政府主导的或是自发的移民，鄂东地区都是移民最先能考虑到的迁入地。而施南府建始县地处“荒陬僻壤”“僻处岩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才的成长，“晋唐而下，纪贤达者亦复寥寥”^⑤。明代仅出谭宗义、徐临庄2名进士。

明代以后，以江陵为中心荆州府的长江渡口优势逐渐丧失，让位于武昌。鄂东地区人才辈出与其自身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有一定关系。“鄂省东部……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河网交织、湖泊密布、堤垸纵横，历史时期以来就是重要的农业经济富庶之地。”^⑥武昌作为明清两代的省会、府治所在地不仅自然地理环境优越，更是尽得风气之先。鄂东的黄冈府“明洪武九年，以蕲州隶，郡治幅员广远。论形势者，谓守江南必先守江北，扼塞五关乃有长江之险，黄冈亦江淮之间一重镇也。其地有山林传泽之饶，其民以渔猎山伐为业，火耕水耨，饭稻羹鱼，食饮还给而亡，积聚所从来旧矣”^⑦。黄冈“盖楚东北之鄙，与蕲、鄂、江、沔、光、寿，一大薮泽也”^⑧。蕲州，“阻山带水，尤为大郡。野沃田良，足以事耕；取材于山，求鲜于水，足以益富，饶物产之盛名于天下。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之类，夫岂无所于取足哉，其间穷崖秀谷，长溪瞿涧，每为名贤逸士选奇而游憩，高僧羽流择地而栖止，又幽胜之具存也，附而书之”^⑨。兴国州“襟山带江，土沃民萃，西连江夏，东出豫章，此为襟要”^⑩。

无论是鄂东的沿江平原还是鄂中南的江汉平原，都是明代湖北进士的高产区，若将两平原地区作一比较，则会发现就明代进士人才来看，鄂东平原又较江汉平原人才更为发达。而如建始县等山区县基本都是明清时期人才较不发达之区，山区自然条件不如平原和丘陵地区，这是影响人

① 王会昌等：《长江流域人才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页。

② 叶忠海：《人才地理学概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③ 吕调元、刘承恩修，张仲炘、杨承禧纂：民国《湖北通志》卷13《舆地志》，“形胜”，第361页。

④ 参见叶忠海：《人才地理学概论》，第7页。

⑤ 同治《建始县志》卷6《选举志》，“甲第”，“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6册，第83页。

⑥ 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3页。

⑦ 光绪《黄冈府志（一）》，“序”，“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14册，第3页。

⑧ 乾隆《黄冈县志》卷1《疆域》，“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16册，第29页。

⑨ 嘉靖《蕲州志》卷1《山川》，“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第55册。

⑩ 吕调元、刘承恩修，张仲炘、杨承禧纂：民国《湖北通志》卷13《舆地志》，“形胜”，第374页。

才成长的直接因素。

再者,明代湖北的政治中心在鄂东地区也是影响人才成长的一个要素。武昌从宋代即成为长江中游的经济中心和军事重镇,而且也是湖广地区的行政中心。武昌府“朝廷封疆大吏及监司以下,咸于此驻节焉”^①。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而北宋时期,金兵南下进攻北宋时,大量的北方人口南迁,带动了长江流域人口增加与经济发展。鄂东地区如鄂州成为南宋的军事重镇,是当时重要的城市。康熙《湖广武昌府志》:“武昌乃都会之地,四方风气所萃,章程声教为诸郡观效而。”^②民国《湖北通志》云:“武昌隶会省,轮蹄辐辏,民俗视列郡稍靡,缙绅服习教化,不改惇愿之习,非公事不入公门。士乐弦诵少纨绔之好,故科第不乏。……人心广大,如其山川之气,不喜争吏长短,楚民故庞厚而鄂为首。”^③武昌府通判张芑为康熙《武昌府志》作序谓:“武昌更为东南一大都会,其山川之美,文物之繁,为有心者所亟欲纵览,延簿书劳攘临眺无瑕,何幸于我。”^④武昌府,“江邑幅员绵亘百里,当省会冲,租税所入不足以备一年之储,仰给者皆湖南、沔汉所轮运”^⑤。“武昌卫三楚都会,辎轩冠盖之所萃,声名文物之所统,江、黄、汉、襄诸境之所观感而则效。”^⑥“汉阳号楚小郡,然地方千里,接壤会省。”^⑦黄陂县,“陂邑距江夏仅八十里,四会无达为人”^⑧。而鄂西南在明代的经济必然是湖北省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鄂西南地区进士人才成长比不上经济发展较快的鄂东和鄂中南地区。

综上,从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两方面来看,对人才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才成长的人文环境影响。而人文环境包含经济发展、教育程度、文化传承等因素。

(二) 移民与经济开发

《湖北通史·明清卷》前言中叙及明清时期是湖北地区经济、社会乃至自然发生巨大改观的时期,首先表现在人口变迁方面,尤以人口的流动为关键。“为人们所熟知的中国人口史上所谓‘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的两次大规模人口流动,均与湖北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以两湖为枢纽。”^⑨

虽然湖北全境作为移民的重要地区,但迁入湖北的移民主要集中在黄州、武昌和荆州等府,即经济开发程度较高的鄂东低山丘陵或鄂中南江汉平原一带。依托长江和汉水交汇地这一地理优势,明中叶商品经济极大发展,促成汉口崛起,鄂东经济开始了繁盛的局面。“以江西为主的外省移民在湖北的分布也由东向西渐减。比如鄂东的黄冈县有96部家谱记载了92个家族的迁徙情况,江西占78族,达移民家族的89%。而偏近鄂西北的谷城县则‘土四客六’。到了西北的郧阳地区,江西移民的数量则退让在山西移民之后了。”^⑩鄂东地区成为江西移民迁入地的主体,黄安“正处于东部的安庆与西部的江汉平原之间,饶州、南昌移民成为移民主体。……鄂东沿

① 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2册,第1页。

② 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2册,第1页。

③ 吕调元、刘承恩修,张仲忻、杨承禧纂:民国《湖北通志》卷21《舆地志》,“风俗”,第570页。

④ 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张芑“序”,“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2册,第20页。

⑤ 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卷3《风俗志》,第165页。

⑥ 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序”,第5页。

⑦ 嘉靖《汉阳府志》,“自序”,“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第54册。

⑧ 同治《黄陂县志》卷1《李序》,“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8册,第5页。

⑨ 章开沅等主编,张建民著:《湖北通史·明清卷》,“前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

⑩ 石泉、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移民研究》,《文献》1994年第1期。

江地带也是饶州、南昌二地移民的交汇点”^①。

地方文献中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如鄂东地区的黄冈县，民国 35 年（1946）《黄氏宗谱》卷首《自政公传》：“元季，宇内鼎沸，齐安一带，诸郡尽为禾黍。有明定鼎，迁饶民于湖北等处。一时间各大姓接壤而居，类皆发源于江右焉。”^② 有关江西移民迁入鄂东地区黄州府的情况，可参见表 4。

表 4 黄州府氏族的迁入时代和原籍统计表

单位：族

时代\原籍	本区	江西						其他省	合计
		江西	饶州	南昌	九江	吉安	其他		
宋以前	11	—	1	—	1	—	—	1	14
北宋	2	1		1	2	—	1	1	8
南宋	2	2	1	2	3	2	2	4	18
元	—	—	4	3	—	—	2	1	10
元末	1	1	7	2	1	1	3	5	21
洪武	3	30	46	11	2	2	7	8	109
合计	19	34	59	19	9	5	15	20	180

资料来源：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 5 卷《明时期》，表 4—1，第 130 页。原表来源于宣统《黄安乡土志·氏族录》、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附录《移民档案》。《黄安乡土志》中有的氏族仅记代数不记具体年代。一族记为 21 代，五族记为 20 代，统计中作为洪武记入。由于此地没有永乐年间的迁入者，明初迁入之氏族皆记为洪武。迁入时间不详及原籍不明的不予统计。有记为“江西兴国县”者，实迁自湖北兴国州，即今阳新市

这 180 个氏族分布在黄州府内绝大部分属县区域，有黄安、黄冈、黄陂、麻城、蕲水、蕲州和广济，因此他们具有代表性。黄安历史上在氏族志中明确记载的土著仅有三族，石氏、马氏和周氏。^③ 黄州府“元末及洪武年间从外地迁入的移民人口仍占全部人口的 62% 左右。……是一个人口重建式移民区”^④。在迁入黄州府的 38.8 万人口中江西移民共有 33.8 万，^⑤ 可见江西移民对黄州府地方社会的影响。

江西移民除迁入黄州府外，也有相当多的人口迁入与黄州一水之隔的武昌府，武昌府的北境属于沿江平原，是重要的农业区。在蒲圻县，1923 年《蒲圻县乡土志》称：“元末明初，江左民族，多自进贤瓦子街移民蒲圻，近日累千累万之盛族，皆此种类也。”^⑥ 又据《大冶县志》：“现

①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编著：《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50—351 页。
② 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6—17 页。
③ 参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 5 卷《明时期》，第 131 页。
④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 5 卷《明时期》，第 132 页。
⑤ 参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 5 卷《明时期》，第 133 页。
⑥ 参见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编著：《简明中国移民史》，第 349 页。

在大冶人口中,土著很少,多数是宋、明以来陆续从江西迁来的,少量来自湖南、四川和浙江。”^①但在武昌府南境的通山、通城等山区,并没有发现洪武期间有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土著民族比移民多。

鄂东地区是接纳江西移民的首选之地。随着人口的增长,移民以黄州麻城为中转站,再往西迁,因此诸如孝感、安陆等地又成为新的移民接纳区。道光《安陆县志》:“闻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城东老户湾数楹而无其人,乌兔山之阴,穴土以处者几人,而无其庐舍,徙黄麻人以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余口,编里者七。”^②“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运动还体现在地名的传承上,江西有瓦屑坝地区曾迁出众多人口至安徽安庆地区和湖北鄂东地区,如蕲州至今还有瓦屑坝一名,李时珍即蕲州瓦屑坝人。

经济的繁荣在文化上的表征即培养了众多人才。“经济固然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人才离不开经济基础。然而,经济不能完全等同于人才,经济与人才间必须有教育、文风、学风等中介。”^③

(三) 文化因素

“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④大体说来,文化一般包括教育、风俗、刻书出版业、文化传承、家学等方面。明代鄂东地区文化勃兴,人才蔚起,黄州府科甲兴旺,更名列各府第一。这种文化地理的变动,彻底改变了湖北文化重心长期徘徊于江汉地区的格局。^⑤

一是官学。“洪武二年,即诏天下郡邑咸立学校。维时江汉之间雄据悉平,武功告成,文教渐揆,其明年而武昌、荆州、德安诸郡相次建学。迄今而戎卫荒狄,亦皆饰胶庠、事弦诵矣,道化翔洽,烝髦云兴,济济奕奕,何其盛也。”^⑥湖北各地的官学大多在洪武年间设立,如武昌府学“洪武三年重建”;黄州府学也建于洪武初年;荆州府学“洪武三年,知府周政创建”;德安府学“洪武三年,通判安恒建于府东北,洪武七年,同知罗子礼复迁今址”;襄阳府学“洪武初,知府张善创建”;汉阳府学“洪武初鼎建”;沔阳州学“洪武初徙建”;施州卫学“建于洪武四年”^⑦。

韩阳《通山儒学记》:“古者上自王宫国都,下及闾巷,莫不有学,所以重学校为政化之源,人才之本也。人才政化之盛衰,每视学校志兴废。”^⑧武昌府内县学,大多在洪武年间创建、重建或维修,仅通山县儒学重建于永乐年间。江夏县儒学“明洪武初,始别创于黄鹤山”,咸宁县儒学“明洪武初草创”,蒲圻县儒学“明洪武中复建”,崇阳县儒学“明洪武初,迁建北城梵安故址”,大冶县儒学“明洪武初仍元之旧,八年灾,十二年重建”,通山县儒学“明永乐中稍迁于左重建,景泰中仍迁旧址”^⑨。

① 《大冶县志》第4篇《人口》,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亦可参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明时期》,第134页。

② 道光《安陆县志》卷3《疆里》,“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13册,第44页。

③ 胡兆量等:《中国人才地理特征》,《经济地理》1998年第1期。

④ [英]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页。

⑤ 参见张笃勤:《明清黄州文化科举兴盛及其社会根源》,《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3期。

⑥ 徐学谟等纂修:万历《湖广总志》卷34《学校》,万历十四年(1588)刻本。

⑦ 章开沅等主编,张建民著:《湖北通史·明清卷》,第596—597页。

⑧ 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卷12《艺文志》,“记”,第599页。

⑨ 参见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卷2《学校志》,第105—107页。

明代,湖北官学校为发达,各类学校设置普遍。府、州、县学是地方官学的主要部分,除了中央官学之外,各个地方也有很多各具特色的书院存在。书院是明清时期的重要教育场所,在文化、教育、学术、人才培养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黄州府进士人才在全省占绝对优势与该府拥有书院的数量多与质量高有巨大的关系。

二是书院。书院既是重要的教育机构,也担负着培养人才的重任。科举人才数量及地域分布能够直接反映一地人才的多寡。有关书院与科举人才之间的关系,李兵在《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①中通过数据统计历代书院与各省进士数量的相关性分析研究后认为从北宋开始,书院数量和进士数量、举人数量的相关系数在不断增长。到明代中后期开始书院为科举服务的倾向十分明显,清廷逐渐改变了初期限制书院发展的态度,绝大多数的书院都是直接为科举教学服务,并且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制度,清代书院与科举关系则更密切。书院直接为科举培养人才的职能发挥相当充分,书院对于其所在地的科举风气是能起推动作用的。“书院虽有官学化的倾向,但毕竟和官学不同,因此,在兴贤育才、活跃学术、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②

书院是生员准备岁科二试,及取得廪、增、附、贡、监等功名者再进一步参加乡试的准备场所,是具有传统教育的功能的。孟森也曾有“清一代学者之成就,多在书院中得之,此固发展文教之一事也”^③的观点。汉口紫阳书院三大功能之一即是“立讲舍以劝学”,“汉口紫阳书院设有义学、六水讲堂、兼山丽泽、主敬堂、启秀书屋等,以为生徒肄业讲学之所,形成了由小学到大学的完整的教学体系”^④。

一地书院数量的多寡与该地考取举人、进士的人数有很大关系。“书院为储才渊藪”^⑤。同治《江夏县志》载:“明洪武二年,令学者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分科设教;三年,定学校射仪。”^⑥有明一代,“湖北书院在地域分布上极不平衡,以黄州、武昌2府为多,明代新建70余所书院中,黄州府占1/3以上,加上武昌府占20%强,两府的书院总数占全省的54%左右。清代黄州府新建书院20所,其中黄冈一县就多达13所”^⑦。

明代初年,湖北的书院并不发达。而据蔡志荣考证,从洪武到成化年间的100多年间仅修建10所,明代湖北共计建立114所书院。^⑧其中,成化年间建5所、弘治年间11所、正德年间12所、嘉靖年间26所、万历年间21所、崇祯年间4所、天启年间2所,洪武、永乐、景泰、天顺分别有1所。“明太祖洪武到英宗天顺接近100年时间,书院处于沉寂时期,几乎没有发展,建立的书院只有4所。”^⑨明初100年是湖北书院的沉寂期,著名学者柳诒徵曾指出,“明初教士,一归学校,讲学书院之风一变,其存者,徒以崇祀儒先耳”^⑩。据邓洪波在

① 参见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04页。

② 章开沅等主编,张建民著:《湖北通史·明清卷》,第104页。

③ 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第553页。

④ 李琳琦:《徽商与清代汉口紫阳书院——清代商人书院的个案研究》,《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⑤ 光绪《大冶县志续编》卷5《学校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6册,第425页。

⑥ 同治《江夏县志》卷3《学校》,“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32册,第95页。

⑦ 章开沅等主编,张建民著:《湖北通史·明清卷》,第612页。

⑧ 参见蔡志荣:《明清湖北书院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55页。

⑨ 蔡志荣:《明清湖北书院研究》,第55页。

⑩ 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参见杨荣春:《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9页。

《中国书院史》统计,“明代湖北兴修书院 112 所,位居全国第 7 位”,“清代 172 所,位居 13 位”^①。

明代还将对科举生员的资助经费纳入地方赋役门类之中,可见地方政府对书院的重视。有关明代湖北将地方科举经费预算归入赋役的例子很多,如应山县将其归入里甲中的“岁用”门中。据嘉靖《应山县志》记载了“一年之用”“三年之用”“五年之用”3 种不同征收周期的预算经费,其中乡会试考生的经费预算为:“三年之用,应试生员花红酒席盘费,新举人花红酒席,旧举人盘费酒席。右三项银两,俱候每年会计酌定其数,随年带征。”^②

三是刻书业的繁荣。明代以前,湖北的刻书出版业有了一定的发展。“经考,宋代湖北出现了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两色套印本图书。”^③“南宋时期刻书点有 170 余处,其中湖北有 20 多处,刻姓名刻工有百余人。这个数字在当时很是可观。”^④宋元两代刻书业发达的地区中,江陵、武昌均为重镇。“武昌在明代是较发达的工商业城市,又是湖广首府、湖广布政司、按察司等重要机关所在地,加之交通十分发达,因而成了长江流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⑤

至明代,湖北的刻书业已经普及。有明一代,湖北境内刻书官刻和家刻众多,明代皇帝子孙分封到各地为王,他们中有些喜欢刻书,底本又多为宋元精本,故所刻之书相对精美。明代麻城周弘祖撰有《古今书刻》一书,湖广布政司刻有《湖北通志》《齐民要术》《地理书》等,汉阳府、武昌府、黄州府、德安府、襄阳府等均有刻书。据陈方权统计,现存明代湖北地方志有 40 余种,保存了明代湖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迁。^⑥明代万历年间人胡应麟评价:“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稀。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⑦而且明代湖北文人大多喜爱刻书,如“公安三袁”刻《珂雪斋游居柿录》《白苏斋类集》;郝敬刻《札记通解》《毛诗原解》《论语详解》《孟子说解》《六经正误》等。“竟陵派”钟惺、谭元春亦在万历年刻书不少。

除此之外,湖北地区也是明代分封藩王较多的地区。自朱元璋开始,先后有楚王、湘王、辽王、惠王等 12 个系列,先后有 44 人约 1/4 的藩王受封在湖北,分封地主要集中在武昌、荆州、钟祥等地,无疑为这些地方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帮助。如武昌和荆州地区的刻书业发达就与明藩王有关,如“楚藩,刻有汉刘向撰《说苑》大字本十卷,半页十行、行十九字”^⑧。

第四,文化传承。“文化这种东西是具有很多特点的,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扩散,也可以称之为交流。”^⑨地域文化传统具有感染力和生命力,它对地域人才的出现和成长起作用,具有地域文化传统优势的地区也成为一地人才成长的一条捷径。明代万历年间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曾描述:“蕲、黄之间,近日人文飏发泉涌,然士风与古渐远,好习权奇,以旷达为高、绳墨为

①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年,第 263、405 页。

② 嘉靖《应山县志》卷 7《赋役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64 年,第 55 册。

③ 陈方权:《湖北刻书考略(上)》,《图书情报论坛》2008 年第 1 期。

④ 陈方权:《湖北刻书考略(上)》,《图书情报论坛》2008 年第 1 期。

⑤ 陈方权:《湖北宋元明清刻书考略(下)》,《图书情报论坛》2008 年第 2 期。

⑥ 参见陈方权:《湖北宋元明清刻书考略(下)》,《图书情报论坛》2008 年第 2 期。

⑦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卷 4,中华书局,1958 年,第 57 页。

⑧ 陈方权:《湖北宋元明清刻书考略(下)》,《图书情报论坛》2008 年第 2 期。

⑨ 王会昌等:《长江流域人才地理》,季羨林“总序”,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7 页。

耻，盖有东晋之风焉。然其一段精光亦铲埋不得。毋论士大夫，即女郎多有能诗文者，如周元孚董夫人辈。”^① 黄州府文脉传承亦盛况空前：“自宋王元之、苏子瞻二公以气节文章照临此邦，山川亦勃发其清淑之气，笃生俊哲，自是以还，理学名儒文采经济，史不绝书，见于明史者五十三人，文物声明遂为楚中之冠。”^②

再如，“夫黄在楚称巨郡，而文献尤甲诸郡。……黄既为楚巨郡，声名文物又与海内大区相比。数其中豪俊兴起于侯之治化，反讹鄙为庞裕，当不逾朝夕”^③。明代王士性评价湖北黄州府科第突出时说道：“江北山川彝旷，声名文物所发泄者不甚偏胜；江南山川盘郁，其融结偏厚处则科第为多：如浙之余姚、慈溪，闽之泉州，楚之黄州，蜀之内江、富顺，粤之全州、马平，每甲于他郡邑。然文人学士又不拘于科第，尝不择地而生。……然世朝以来江南彬彬乎盛矣。”^④ 明代汉阳县“蔡溶如字元度，博雅能文，以贡为湘阴教谕，流寓滇越。晚乃归里……作《四无诗》以见志，学者争相传写。性耿介不妄取，虽困穷泊如也一夕”^⑤。

第五，家学渊源。“人才学上的‘霍桑效应’认为，人才处于群体的良好人际关系与心理氛围里，会导致士气高涨、成效倍增的动力驱动作用。这种氛围越强烈，对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也更为有利。”^⑥ “古代祖籍的比重较大，无论是哪一层含义，籍贯对人才成长有重大影响。根据 80 年代计量研究，家庭对人才成长权重高达 40%。”^⑦

从江陵张氏、黄冈万氏、黄梅瞿氏的人才群体可见家族环境对人才成长的影响力。据史料记载明朝江西张氏 5 个儿子分别迁居湖北江陵、四川遂宁、江苏丹徒、安徽桐城和吉林长白山，五房都有人中进士，共出进士 11 名、榜眼 1 名、传胪 2 名，正所谓“一支五房，甲科蝉联，数世不绝”^⑧。可见家族文化对人才培养的深远影响。其中湖北江陵的这一支诞生了首辅张居正、状元张懋修，进士张敬修、张同敞等人才。

黄冈万氏，自万一奇中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开始，不断有族人走上科举入仕的道路。国民政府陆军上将万耀煌曾回忆：“我万氏祖先，于明初自江西迁居湖北黄冈五湖之滨，子孙散处，累世簪缨。有清一代，自康熙三十七年至光绪二十九年，凡九科进士、四代翰林、三十六科举人，科名之盛，冠于本邑。”^⑨

黄梅瞿氏即为明代有影响的文化世家。瞿九思，《明史》有传，是明代著名的学者和理学家，九思之父瞿晟，嘉靖己酉科举人，癸丑科进士，官任广平知府。九思叔父瞿星，以文词与晟齐名，嘉靖癸卯科中举。九思 10 岁即随父宦吉安，师从罗洪先，罗洪先以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罢归后终日著书讲学。九思拜他为师，这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而九思 15 岁作《定志论》，后从同郡耿定向游，学益进。曾主讲濂溪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江汉书院等。江汉书院位于

① 王士性：《广志绎》卷 4《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 年，第 92 页。

② 光绪《黄州府志（一）》，“序”，“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 14 册，第 3 页。

③ 光绪《黄州府志（一）》，“潘志序”，第 18—19 页。

④ 王士性：《广志绎》卷 1《方輿崖略》，第 5 页。

⑤ 光绪《续辑汉阳县志》卷 21《文苑》，“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 5 册，第 2 页。

⑥ 王会昌等：《长江流域人才地理》，季羨林“总序”，第 35—36 页。

⑦ 缪进鸿：《不同专业人才成长规律的初步比较研究》，缪进鸿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9 页。

⑧ 姚德昌：《历代进士之间的血缘关系举隅》，参见缪进鸿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 272—273 页。

⑨ 万耀煌口述，沈云龙等访问，郭足以校阅：《万耀煌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 年，第 2 页。

黄梅、广济毗连的鸿硃洲（即今武穴垅坪）。九思在该院讲学多年，治学严谨，门徒皆有建树。九思有4子1女，长子甲“性颖异，书一览成诵”^①；五子瞿罕7岁能文，博通五经子史，著述凡24种。《明神宗实录》记述：“先是湖广黄梅县举人瞿九思忤权韬迹，洁志潜修，三十年著书几十数种。先后地方官奏荐，诏授翰林院待诏。九思疏辞，乞终著述余业。……拟暂准瞿九思原官致仕，仍令有司月给米五石，以示资助，书成之日该抚按官奏荐进呈酌量擢用。上是之。”^②

麻城即有梅、周、李、刘四大家族：梅氏有梅国桢、梅之焕；周氏有周弘祖、周思敬、周思久；李氏有李文祥、李长庚、李中素；刘氏有刘天和、刘承禧。《明史》有传的有梅国桢、梅之焕、刘天和、周弘祖、李文祥、李长庚。据民国《湖北通志》统计，此四家族明代共培养出43名进士，占麻城县104名进士中的41%强。另外还有耿氏，“当年麻城（笔者注：黄安初属麻城，1563年始分治）士人进学中举，几乎为这三家（耿、周、梅）包办”^③。汉阳县明代“赵蕃，教授弼之子，服膺家学，颇有文名。举正统辛酉乡试，戊辰成进士，授主事”^④。“王宁，字子安，少补诸生，有名。邑读书家，以宁拥皇比为重，诗文清丽如精金美玉，书法出入洛神，乐毅识者尤爱之。”^⑤据民国《湖北通志》载，王宁有《云在楼集》传世。京山县“山川之秀，甲郢。复英灵所诞，复出流辈。……邑多山泉，民引泉为机，以椿为磨。人乐为士，有累世业儒之家，父子兄弟一时同游庠序者”^⑥。

第六，人才交流。俗话说“近朱者赤”，人才群体间的交流无疑是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就黄州府来看，前有苏子瞻“滞黄数稔”^⑦。蕲黄合治以后，黄州府“上游作楚门户……从来地以人重，人以文显。昔苏文忠以迁客来此，不治民事，王元之，两制旧臣，一麾出守，故竹楼、赤壁、雪堂、月波楼诸作，寄托旷达，未可云经国大业也”^⑧。

明代湖北进士人才间互相交流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周振，字若临，麻城人，“万历己未进士，不应选，逍遥林下。家在乡，去县治百里，而近足迹不一。岁时伏腊，亦乐与田夫牧豎工饮。姚希孟以书劝之，仕不报”^⑨。嘉鱼李承箕往广东拜师白沙学派陈献章，几经磨难，“自嘉鱼至新会，涉江浮海，水陆万里，先生往见者四”^⑩。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寓居于黄安、麻城等地，就是明代鄂东地区人才交流的最好例证，在文学界和思想界都引人注目。李贽的到来对湖北地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

本文责编：詹利萍

① 光绪《黄梅县志》卷26《人物志·孝友》，1996年重印本，第367页。

② 《明神宗实录》卷469，万历三十八年（1610）闰三月“己巳”条，见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明实录·朝鲜王朝实录·清实录资料库》，1962年影印本，第8862页。

③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6年，第218页。

④ 光绪《续辑汉阳县志》卷21《文苑》，第1页。

⑤ 光绪《续辑汉阳县志》卷21《文苑》，第6—7页。

⑥ 吕调元、刘承恩修，张仲炘、杨承禧纂：民国《湖北通志》卷21《舆地志》，“风俗”，第576页。

⑦ 光绪《黄州府志（一）》，“序”，第18页。

⑧ 光绪《黄州府志（一）》，“序”，第3页。

⑨ 吕调元、刘承恩修，张仲炘、杨承禧纂：民国《湖北通志》卷154《人物志》，“隐逸传”，第3625页。

⑩ 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5《白沙学案上》，“举人李大厓先生承箕”，第93页。